

(上接A1版)

去年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因为不确定因素太多,没有制定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但是反复权衡,还是制定了就业目标,也就是城镇新增就业900万人以上。因为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之基,也是财富创造的源头活水。当时我们也提出,要努力实现全年经济正增长,实际上是相信只要能够实现900万人以上的城镇新增就业,就有经济的正增长,因为有就业就有收入,就可以带动消费、拉动经济。

去年,在以习近平总书记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经过全国上下共同努力,我们的市场主体表现出坚强的韧性,广大人民共克时艰,最后实现了城镇新增就业1186万人,全年经济增长2.3%,居民收入相应增长,都好于预期。

今年我们的就业压力仍然很大,城镇新增劳动力约1400万人,其中高校毕业生909万人,创历史新高,还要保障退役军人就业,还要为两亿七八千万农民工提供打工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在制定宏观政策的时候,依然坚持就业优先的政策,我们继续推动“六稳”、落实“六保”,还是把就业放在首位。去年出台的有关就业的政策举措,不仅没有调退,还有所增加,其他政策都要有利于就业。我们相信,通过经济稳定恢复增长,会带动更多的就业岗位,而更多的就业岗位会推动经济稳中向好。

今年我们确定新增城镇就业的目标是1100万人以上,希望在实际执行中还可以更高一点。我们也很明确,就业还是要让市场来唱主角,也就是继续通过保市场主体来保就业。一方面推动稳岗增岗,另一方面拓展就业渠道。去年疫情中就业方式也有新变化,像我们这几年发展的新动能,包括网购、快递等逆势快速增长,也带动了就业和传统产业发展。我们一方面要继续鼓励增加相对稳定的就业岗位,也要广开灵活就业的渠道。现在中国的灵活就业正在兴起,已经涉及到两亿多人。有的人打几份工,很辛苦,所以我们应该给他社保补贴,特别是要用机制性的办法来解决可能出现职业伤害问题,给他们提供基本的权益保障。这也有利于灵活就业市场更加健康、稳定地向前发展。

至于刚才记者朋友提到的老年人问题,中国老龄人口已经有两亿六千万,老龄产业也可以说是一个巨大的朝阳产业,它带来了多样化的需求。正因为中国市场多层次、多样化的需求,这样一个广大的市场也必然会给外国企业的产品、服务乃至于投资创造更多机会,因为我们的市场是开放的。

中国有14亿人口,劳动力资源可以说是最丰富的资源,中国人民又能够吃苦耐劳,只要有就业门路就能多挣。“民生在勤,老幼则匮”。我相信中国人民会用自己勤劳的双手,来逐步迈向共同富裕。

西班牙埃菲社记者:美方指责中方对上月到访武汉的世界卫生组织专家组缺乏透明度,专家组组长指出中方同事分享了大量工作细节,同时也表示专家组希望获得在2019年10月至12月之间与新冠肺炎疫情相似疾病病例的更多原始数据,中方是否愿提供这些数据,或者是否愿再次接待专家组访华?

李克强:新冠肺炎疫情一起突发的全球公共卫生事件,中方和各方一样都希望能够尽快查清病毒是从哪里来的,这样有利于切断传播的渠道,更好更有效地来防控疫情。但疫情溯源的确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问题,需要各国加强合作,持续研究。中方本着实事求是、公开透明、开放合作的原则和态度,同世卫组织保持沟通,也支持世卫组织专家在华开展溯源研究工作。下一步我们还愿意继续同世卫组织一道,推动科学溯源工作。

当前疫情还在全球蔓延,当务之急不仅要溯源,还要做好各种防控工作,包括接种疫苗等。新冠病毒是人类共同的敌人,我们希望各方携起手来,因为在这样一个人类共同的敌人面前,没有哪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我们也坚信人类有能力最终战胜这个病魔,我也希望明年我们能够面对面进行交流。

日本经济新闻记者:您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2021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目标为6%以上,目前很多国际机构都认为中国2021年经济增长有可能达到8%左右。在“十四五”开局之年,除了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加大,还存在着由于世界性的资金过剩导致房地产投资过热的风险,现在中国政府采取了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请问总理,在

这样的情况下今年是否存在宏观政策转为偏紧的可能性?据日本经济研究中心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将于2028年超过美国,对此您有何看法?

李克强:我注意到,我们提出6%以上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确实引起了多方面的关注,有不少分析。有的认为是积极的,也有的认为低于预期。我们当然乐见经济向好,但是也清醒地看到,今年是在恢复性增长的基础上前行,有很多不可比的因素,而且世界经济复苏不确定性依然很大。我们说增长6%以上,6%不低了,现在的经济总量达到100万亿元,增长6%就是6万亿元,这要放到“十三五”之初,需要8%以上增速才能达到。而且我们说增长6%以上上是开了口子的,实际过程中也可能增长得更高一点。但是我们不是在定计划,是引导预期,希望把预期引导到巩固经济恢复增长基础,推动高质量发展,保持可持续性,尤其是和明年、后年的目标相衔接,不能造成大起大落,否则会扰乱市场的预期。一时走得快不一定走得稳,只有走得稳才能走得有力。我们还是希望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经济能够行稳致远,保持长期向好。

去年面对罕见的巨大冲击,我们及时果断采取措施,但也保持定力,没有搞“大水漫灌”。我们新增财政投资规模2万亿元,绝大部分都是用于市场主体和民生急需,主要是减税降费、保基本民生,而且采取了直达机制,就是把这些“救命钱”最快7天时间直达基层,来保证基层减税降费、稳岗等财力,很快就见到效果。如果我们当时重点考虑上大项目、搞大产业,这不是不需要,但这要经过论证还要考虑市场需求,时间恐怕得200天以上,就不是仅仅一周时间了。错过了时间,企业可能会大批倒闭。我记得去年在记者会上,也有记者提出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规模和力度是不是偏小了。我们是把“肥”施到根子上,政策打到了点子上,所以起效快,有作用。现在看,这个规模、力度是合理的,准备的储备政策后来也没有用。

去年我们没有搞宽松政策,或者说所谓量化宽松,今年也就没有必要“急转弯”,还是要保持政策的连续性和可持续性,着力稳固经济,推动向好。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还是要注意把“肥”施在根上,现在市场主体特别是中小微企业还在恢复元气中。由于经济恢复增长,我们要合理调整政策,但调整是适度的,有些阶段性政策退了,同时又用一些结构性减税降费政策来冲抵影响,保持保就业、保民生、保市场主体的力度不减。

怎样保持力度不减?资金规模固然很重要,但用好钱更重要,我们去年宏观调控积累的经验还可以继续用。比如在财政金融方面,简单地说,就是要“一减、一增、一稳中有降”。“一减”,就是减少中央政府本级支出,各级政府都要带头过紧日子;“一增”,就是扩大直达资金范围,让基层和市场主体感到政策支持力度不减,这样能够更快更有效地惠企利民;“一稳中有降”,就是在稳定杠杆率的同时,引导金融企业合理让利,使中小微企业融资更便利、融资成本稳中有降。当然,我们对各类风险隐患,也会及时防范化解。

中国发展的根本目的是要让中国人民过上好日子,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会立足于着力办好自己事。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发展都是重要贡献。

中国新闻社记者:总理您好。前两年住院费用的异地报销问题得到了解决,极大地便利了异地就医。但是很多人外出打工,也有不少老年人是异地养老,他们门诊的看病开药还需要回原籍报销,非常不方便,所以请问门诊费用的报销何时能得到解决?

李克强:我在中国政府网的实名留言中,也看到了这类问题。的确,在一些学校门口,大家看到很多老人在接送孩子,这些老人不少是异地养老的,或者就是来帮子女带孩子的。他们中有人经常为异地报销医疗费奔波烦恼,这个问题应该下决心逐步解决。今年我们要扩大门诊费用跨省直接报销的范围,到明年年底前每个县都要确定一个定点的医疗机构,能够直接报销包括门诊费用在内的医疗费用,不能再让这些老人为此烦心。这件事,还有类似的事,看似不大,政府工作人员多费些心,就可以让老人、让家庭多一点舒心。

凤凰卫视记者:过去一年香港因为疫情饱受打击,未来两年又将进入选举年,此时全国人大会议就完善香港的选举制度作出了决定,人大常

委会将就香港选举的相关法律进行修改。外界对于“一国两制”如何继续实践充满关注。您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将来要如何行稳致远?

李克强:我们明确提出,要继续全面准确地贯彻“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针,严格依照宪法和基本法办事,落实好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全力支持特区政府和行政长官依法施政。

刚才你问到全国人大就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作出决定,决定很明确,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一国两制”的制度体系,始终坚持“爱国者治港”,也是为了确保“一国两制”行稳致远。去年香港受到了多重冲击,我们希望香港各界能够携起手来尽早战胜疫情,实现经济恢复性增长,改善民生,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中央政府会继续全力支持。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记者:国家提出建设科技强国,但是目前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技术上我们还存在短板,甚至出现了“卡脖子”的情况。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了一些急功近利的现象,比如在一些地区,一些高新产业项目的大规模投入出现了烂尾。请问您如何看待这样的情况?未来政府在推动科技创新方面还会有哪些新的举措?

李克强:多年来,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一些重大突破,在应用创新领域发展得也很快,但是在基础研究领域的确存在着不足。要建设科技强国,提升科技创新能力,必须打牢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这个根基。打多深的基,才能盖多高的楼。不能急功近利,要一步一个脚印地走。

目前我国全社会研发投入占GDP的比重还不高,尤其是基础研究投入只占到研发投入的6%,而发达国家通常是15%到25%。我们下一步要加大基础研究的投入,还要继续改革科技体制,让科研人员有自主权,很重要是要让科研人员有经费使用的自主权,不能让科研人员把宝贵的精力花在填表、评比等事务上,还是要让他们心无旁骛去搞研究,厚积才能薄发。讲到这里,我想对青年学生们说几句话,不管你们将来从事什么职业、有什么样的志向,一定要注意加强基础知识学习,打牢基本功和培育创新能力是并行不悖的。树高千尺,营养还在根部。把基础打牢了,将来就可以触类旁通,行行都可以写出精彩。

创新还是要依靠市场力量。企业是创新的主体,“十四五”期间政府会继续加大科技投入,同时要更多地依靠社会力量加大研发投入,所以我们要增加“全社会”这个口径下的研发投入。这就需要采用一些机制。比如今年我们采取对制造业研发费用投入加计扣除100%的措施,这实际上是一项税收优惠,就是想通过市场化普惠制的办法,使企业投资研发有动力。当然,研发要靠人才,中国的人才资源是丰富的。我们一方面要让领军拔尖人才脱颖而出,另一方面也要看到普通人才也有上上晋。这些年我们推动“双创”,形成“众创”局面,推动了应用创新,也给整体创新带来了更大空间。

我们说科技要自立自强,科学家要发奋努力,这和国际合作、同行交流是并行不悖的。科学探索和发明发现是需要合作的,需要共同努力。封闭不会有前途,断链对谁都没有好处。中国愿意在保护知识产权的基础上,同各国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记者:美中两国关系在过去几年跌入建交以来的低谷,中方高层官员多次表示这是由于特朗普政府实施极端错误的反华政策造成的,他们也希望,美国拜登政府可以拨乱反正。但是许多来自华盛顿的声音表示中方的判断和立场忽视了重要的两点:一个是双边关系恶化是双方的原因,而不是中方常说的责任完全在美方;还有一点就是在对华态度以及重大政策上,无论是疫情溯源还是香港、新疆等问题,美国的民主和共和两党其实有着高度的共识。请问您对这些来自美国的观点有何回应?尤其是在美中两国将于下周在阿拉斯加举行拜登上台之后的首次高级别会谈之际,中方会不会调整或者改变相关政策立场,推动双边关系的重启和修复?

李克强:过去几年中美关系的确遭遇了严重的困难,给两国和世界都带来了不利的影响。中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最大的发达国家,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中美建交40多年了,风风雨雨,能越过坎坷向前走,还是因为符合世界发展趋势,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

我们希望双方按照习近平主席最近和拜登总统通话的精神,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互不干涉内政和内部事务,秉持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推动两国关系向着健康稳定的方向发展。这既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中美两国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社会制度不同,彼此相处难免会有矛盾、有分歧,有的时候甚至比较尖锐,关键是如何对待。中美两国人民是有智慧、有能力的,双方还是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地进行对话沟通。我们希望中美有多领域、多层次对话,即便一时谈不成共识,也可以交换意见、增进释疑,这有利于管控和化解分歧。

中美两国有着广泛的共同利益,有许多可以合作的领域。在去年多重冲击的背景下,中美两国的贸易规模仍然达到4.1万亿元,增长8.8%。我们还是应当把更多精力放在共同点上,去扩大共同利益。中美两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稳定、促进世界繁荣发展,都有重要责任。应该推动中美关系越过坎坷往前走,向着总体稳定的方向走。

新华社记者:您一直强调要重视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发挥市场主体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现在有一些市场主体反映,在生产经营、公平竞争、市场环境等方面还有一些困难和障碍。请问今年政府将出台哪些改革措施来助企纾困,让他们焕发新的生机?

李克强:去年我们推进改革,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制定和实施宏观政策时,围绕市场主体的需求来考虑,助力市场主体脱困、激发活力,撑起中国经济的基本盘。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培育和发展市场主体。市场主体培育起来,就可以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十三五”期间的五年,我们的市场主体增加了6000多万户。去年在疫情冲击下,后期快速恢复增长,现在市场主体总数已经达到一亿三千多万户,而且去年个体工商户又新增1000多万户,从8000多万户增加到9000多万户,带动两亿多人就业。市场主体在活力激发、活跃度提高,这是政府推进改革的努力方向。

今年我们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还是要继续围绕市场主体转,这就需要继续推进“放管服”改革,让市场主体不仅生存,而且活跃。去年我们说留得青山,就赢得未来,今年说留得市场主体的青山常在,就能够生机盎然,使中国经济的活力和韧性充分体现。所以转变政府职能很重要是要把市场主体应有的权限给他们,让他们去发挥。对于审批环节,我们要继续减环节、减材料、减费用、减时限。一方面为市场主体减负,另一方面为他们松绑,放开手脚去竞争。

当然,要竞争就应当是公平的竞争,就必须有监管。管出公平、管出公正,这样才能让市场主体显示真正的创造力。所以我们放管并重,创新监管方式,加强事中事后监管,这都是改革。我们支持“互联网+”、物联网这些新业态,但是对于坑蒙拐骗、造假失信,或者利用新业态的旗号去搞诈骗、非法集资的,就要坚决打击,因为把市场搅乱了,没有公平,竞争就不可能持续,就不可能展现更强的活力。

政府还要进一步优化政务服务,为企业重质量、守诚信、精工细作去提高产品和服务竞争力来营造环境。对于政务服务中那些涉及企业、人民群众经常要办的事项,务努力做到网上办、掌上办、一次办,让市场主体有更强的活力,社会有创造力。

台湾无线卫星电视台记者:今年年初,台湾方面表示希望跟大陆能够在后疫情时代恢复交流。与此同时,两岸关系目前并没有看到和缓的迹象,请问大陆方面对此怎么看,未来又如何因应?

李克强:我们对台的大政方针是一贯的,也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在此前提下,我们欢迎台湾任何政党、团体同我们交往,也欢迎台湾各党派团体人士就两岸关系和民族未来与我们开展对话。

我们坚持推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和祖国统一,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也反对外部势力的干涉。

我们一直秉持“两岸一家亲”的理念。这几年出台了很多惠及台企台胞的政策,不少台湾企业和同胞从中受益。我们会继续让台湾同胞分享大陆的发展机遇,继续推动两岸融合发展。

人民日报社记者: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民生领域一些难题凸显,如就医、子女教育、养老托

幼等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短板,也影响了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请问政府打算从哪些方面着手来解决这些难题?

李克强:今年政府总支出比去年略有增加,盘子不小,所以要更多地向量大面广的民生领域倾斜,特别是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如果下半年经济持续向好,那么会下更大的力度把财政支出包括债务支出投向这些领域。这对拉动当年GDP增长可能不明显,但是对于长远发展、惠民生有支撑作用。我们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人民的政府就应当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

教育和健康关系到每个家庭、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我在两会参加代表团审议时,一位中学校长说,现在县乡中学还缺乏优质的教师资源,教师的待遇不高,学历也很难提高。我们今年要下决心,加大对县乡教师培训的投入,让他们能够在履职便利地提高学历,职称评定要采取倾斜政策。对于在城市的农民工子弟,只要拿到居住证,一定要让他们有受教育的权利。决不能因为家境、区域不同,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机会公平中,教育公平是最大的公平。

健康是幸福的基础,也是生产力。现在县乡基层的医疗机构和力量还比较薄弱,很多人有病往大城市大医院跑。今年我们要多措并举加大对县乡医院、卫生院的投入,对于扩大门诊医保报销范围和常见病药品报销范围、降低药品和高值医用耗材价格等,都要采取一些让群众切实感受得到的措施。也就是说,要让群众看病多一点便利,治病少一点负担。这也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防止因病返贫致贫。

在养老托幼方面,政府还要通过引导社会力量来兴办社区服务业,尽可能在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支持,给家庭在养老托幼方面不仅减轻一点负担,也多一点温暖。总之,民生方面的事很多,我们要在发展中持续改善民生。我们现在实施的是广覆盖、保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保基本,要在经济发展中持续提高水平,但也要突出重点。对于事关人民、事关国家和民族未来的义务教育和基本医疗,各级政府一定要扛在肩上。

新加坡联合早报记者:中国提出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请问这不是中国在美国等西方国家“围堵”下被迫采取的某种战略收缩?另外,在中国发展国内大循环、构建起大规模的国内市场的時候会带来怎样的变化?留给外资的空间未来会不会越来越小?

李克强:中国提出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这既是要做大国内市场,也是要扩大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度融入世界经济,可以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起门来是没有出路的。中国会不断地、主动地扩大开放,这是中国自身利益的需要,也有利于世界。中国把内需市场做大,带动自身发展,也会给外资、外国产品和服务带来巨大的机会。我在参加代表团审议的时候,一位企业家说,抓住内循环就是要开拓国内市场,抓住双循环就是要开拓国际市场,两个市场还可以打通。他说得很朴实,但言简意赅。

开放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相向而行。经过8年的努力,去年东盟10国、中、日、韩、澳、新15国谈成了RCEP协定,这是世界上最大的自贸区,是不同社会制度、文化习俗、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共同建设的。这说明,只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可以谈出共识,找到共同利益,扩大各国人民的福祉,而且有助于地区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会给世界经济增添动力。中国是世界产业链、供应链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不仅要发挥自身的作用,而且还要履行自身的责任,维护以世贸组织规则为基础的多边贸易体制。只要是对互利共赢有利的,无论是多边、双边的机制,我们都持积极开放的态度。

我们会进一步主动地对外开放,继续缩减外商来华投资负面清单,继续推动包括服务业在内的对外开放。我注意到,很多外企关心中国的营商环境,我们还要继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总而言之,通过多种努力,在扩大内需中不断扩大开放,继续让中国成为外商投资的重要目的地、世界的大市场。投资者采用网络视频形式进行,主会场设在人民大会堂三楼金色大厅,分会场设在梅地亚两会新闻中心。记者会历时约110分钟。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

加强废旧动力电池管理 培育集中报废再生基地

油汽车的产业拐点即将来临。至2020年末,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达到492万辆,同比增长29.2%。根据《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到2025年我国新能源汽车

渗透率将达到20%,这意味着今后五年新

新能源汽车销量年复合增速将高达30%以上,2030年我国新能源汽车保有量有望达到8000万辆。有机构预测,随着新能源汽车的大幅增长,我国废旧动力电池规模在

2020年达到24万吨,到2025年将大幅增长至78万吨。由于废旧电池的潜在污染性非常大,如何消化大量的废旧动力电池成为一个极为棘手但又不容回避的难题。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农村信用社联合社党委书记、理事长孔发龙在今年两会上建议,应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电

池管理。孔发龙介绍,目前,国家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相应的政策,积极引导、鼓励、支持动力电池回收利用和无公害处理。但现实中依然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一是

不同动力电池厂商生产的动力电池产品繁多,标准不统一,拆解回收工艺复杂、成本较高,自动化、规模化、产业化程度低;二是废旧电池回收渠道少、流程长、存储难,高达70%左右的废旧动力电池流入了非正规渠道;三是具有回收白名单资质的企业较少。截至2020年末全国仅有22家“白名单”企业,同时有5000多家企业和小作坊从事动力电池回收相关业务,国内动力电池市场乱象丛生。

孔发龙说,为大力推动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发展,防止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



率,建议进一步加强新能源汽车废旧电池管理。一要压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督促电动车生产厂商、动力电池生产厂商将电池回收利用纳入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体

系之中,使每一块动力电池都能实现覆盖从生产销售、到消费使用、再到回收销毁等全周期的跟踪和溯源,对违反规定的生产企业给予包括无法获得新能源汽车产品市场准入在内的严厉惩处,从源头上建立完善废旧电池的回收处置体系;二要推动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积极培育大型动力电池回收处理的专业企业和动力电池集中报废再生基地,出台针对性的财税政策,在设备采购、研发投入、政府补助等方面给予更大力度的支持,推动动力电池回收产业化、商业化发展;三要加强回收利用技术创新。组织实施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技术攻关,重点在电池自动化拆解技术、正极负极材料定向循环技术、锂离子电池循环技术、电池健康状态评估技术等方面寻求更大突破,进一步提升废旧电池的回收能力和利用成效。



□ 本报记者 史晓菲

在政策扶持和技术进步的双重加持下,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自2014年以来迎来了爆发式增长,新能源汽车替代传统燃